



從中國上古史到東亞史前史—— 曲折的史學道路

黃銘崇*



我的研究領域一般稱為「中國上古史」或「先秦史」。其實，不同名詞的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糾葛與史觀的連結。比方「先秦史」，連結的是過去中國帝制時代的王朝，史觀上很難不向《左傳》、《史記》、《漢書》等看齊，其特性套用傅斯年的講法就是「『著史』一帶有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中國上古史」所連結的則是現代的「中國」，中華民國的中國上古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上古史又各有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上古史的史觀源自於一個嚴格對內部思想控管的政府，它是孤立的、封閉的、巨大的、農業至上的，它與世界的關係特別是西方世界是對抗的，對於歷史上的不同文化，特別是弱勢文化（如東夷、西戎、南蠻、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北狄)基本上是鄙夷的。其史觀則是以「共產黨」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建立一條隨時可移動的紅線，讓知識階層可以在紅線裡頭「自由移動」。

中華民國的中國上古史觀念不是單一的，比較進步的可以李濟主編的《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為代表。李濟的中國上古史雖然與傳統的中國史學有連結，但是其本質是一個現代的領域，而且與現代科學的考古學有密切的關係。李濟有意識地揮別「先秦史」，他認為傳統的先秦史著重政治史而且完全依賴傳世文獻，他的中國上古史則具有跨學科的視野，運用不同類的材料，涵蓋古環境、考古、歷史、文學、思想等以改寫中國上古史。他完全放棄《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中具有神話特性的記載，以考古資料建構的「史前史」來取而代之。其「信史」始於商代，商代以前則完全以考古資料重新建構與認識，即便是對於商代的認識也多以考古材料為核心。李濟上古史的構想的先進之處還在於他認為上古史必須跨出現代中國的框架，涵蓋東北亞（包括西伯利亞）、東南亞與中亞，澈底了解不同史前文化的現象與關聯。《中國上古史·待定稿》使用的材料、研究方法、史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古史比較，是更開放的，更能與世界連結。李濟之後的第二代、第三代學者中的代表人物張光直、許倬雲、杜正勝基本上都是在這樣的框架下發展，各自有不同的側重點，也都有很高的成就。

臺灣近來主體意識抬頭，這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所使然，我們可以用更自由、更寬廣的眼光來了解古代社會與歷史，因此絕對無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上古史」，特別是那條可移動的歷史紅線。「先秦史」的概念，現在也還有不少學者抱著不放，但是其研究方法具有「反時代」的特質，在大量考古學資料出現與當代社會變化的雙重衝擊下，岌岌可危。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輩所建立的「中國上古史」固然是上述三種選擇當中最優的，但是它畢竟是以秋海棠葉般的中國領土為出發點的上古史，從臺灣主體性的角度出發，不無扞格。歷史與現實的社會政治之間的糾葛是無法避免的，問題是歷史研究要走在政治前面，還是被政治牽著鼻子走？臺灣人如何超越一個以「秋海棠葉」為藍圖的中國上古史？新的典範會是什麼？這不是一個能簡單地回答或忽略的問題。

2009年起因為開始在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的關係，有機會暫時放掉一些過細的研究工作，花時間構思與備課。備課所花的時間雖多，但是對於個人研究的回饋與成長更多。在備課過程中有兩本書對我有很大



啟發，一是劍橋大學 Colin Renfrew 教授的 *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2007)，他把智人以前視為自然史的一部分，把智人出現以後，開始有現代人的意識作為史前史的開端，幫我解決了我的課應該「從哪裡開始」的困惑。同時書中對基因研究的整理與討論，言簡意賅，直述重點，也讓我卸下心防，學會閱讀基因研究的資料。牛津大學 Barry W. Cunliffe 教授的 *Europe between the Oceans: Themes and Variations: 9000 BC-AD 1000* (2008) 則是一個運用年鑑學派 *longue durée* 的概念，整合大量的考古材料寫成的歐洲上古史。以冰河時期的環境為起點，當時地球的水分被大量地鎖在兩極，海水面下降使得英國的島嶼與歐陸連結，萊茵河與泰晤士河都是「英法海峽河」的支流，此時的歐洲是介於兩洋之間。他將這一萬年區分成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或是幾千年或數百年，著眼於生態環境的變化及人群的移動現象。這樣的內容深深地吸引著我，也自忖如果一個現代的英國學者可以很自然地構思歐洲上古史，為何我們沒有對應的「東亞上古史」？我們沒有可能也從一個島嶼國民的角度出發，去審視整個東亞的上古史？

東亞上古史比歐洲上古史困難得多，最主要的因素是東亞考古研究中的國族因素非常強烈，加上整個東亞語言比起歐洲更複雜，牽涉的語系更多，要同時掌握數種語系並不容易。這當然是個十分困難的工作，也絕非我區區一人能夠完成。不過，一旦心態與目標改變，研究的視野完全不同。比方過去對於日本或韓國的考古，因為各種因素會有很大的畏懼感，可是當我們忘掉國界把中國的東北與日韓早期考古材料一起觀察，我們開始了解為何日韓考古無法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熟悉的框架來理解。過去中國考古學研究一直以農業為最關鍵的生業，過度強調農業起源與其影響。然而有些生態區域一直採取狩獵採集，一直到農耕者破壞性地介入才發生改變，中國東北、西南、韓國、日本大體上就是如此。這片廣袤的「東亞」其實是由不同的生態區塊所構成的土地，這種生態區塊與國界無關，而且隨著氣候變遷生態區塊之間會有消長。不同區塊有不同的植被與不同動物，也適合特定的生業活動。

雖然有了這樣的視野與目標，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很多的困難，但是或許也更符合我的長處與興趣。我喜歡比較的視野，框架性或結構性的思考與大規模的整合工作。能夠獲得傑出研究獎或多或少與近來的研究往這個方向發展有關。比方，過去學者研究金屬器進入中國，著眼於本土與西來的差

異，我則注意此種技術進入東亞時，東亞本土高超的陶器工業如何與新的技術碰撞，而產生獨樹一幟的塊範法青銅鑄造技術，創造了「重器時代」。關於商與西周，我也不再從兩個連續王朝的角度來看，而將歷史的狀況視為兩個農業大國，在特定環境變遷的狀況下的競爭，周方有效地掌握了草原相關的技術，因此在競爭中獲勝。我的眼界與心態也從「文明」發生的區域，逐漸朝著「非文明」的區域，開始了解為何有些生態區塊一直或很晚才進入「文明」的領域。

這次得到傑出研究獎，是一種鼓勵。不過，對我而言是激勵我不要滿足於目前這樣的研究，而是朝著更寬闊的目標——東亞上古史的方向前進。